

我，在研究中有意识地进行自主理论思考。希望再过30年，当《中国社会科学》创刊60年时，中国政治学界不仅可以充分表述自己，还能成为概念、方法、理论和思想的生产者和出口者。

〔责任编辑：范勇鹏 李彩艳〕

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社会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和新时期的世界历史研究

于 沛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世界历史研究最深刻的变化，是在其发展历程中，实现了从翻译、编译，以及一般性地介绍向深入、系统、独立研究的转变，“世界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完全具备了任何一门科学学科所具有的科学形态，以及不可或缺的理论和方法。世界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研究队伍的成长、壮大，以及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问世，其地位和影响日渐扩大，当然，这是就世界历史整个学科的状况而言。今天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无论在通史、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还是在专门史、历史人物、历史文献的研究上，都可谓硕果累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前无古人”，“史无前例”。党的十七大报告论述“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时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① 这使广大世界史工作者不仅深受鼓舞，更深感责任重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使世界史研究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我们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明确的回答。

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是重视对中国及周边区域和国家历史的研究。司马迁《史记》，分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五类，计130卷。有关周边区域和国家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列传”中，如《大宛传》、《匈奴传》等，包括有朝鲜、越南、印度，以及大宛、乌孙、康居、燕蔡、大月氏、安息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 是司马迁历史思想的核心。而要达此目的，需要对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了解。《史记》以下的二十五史，除了《陈书》、《北齐书》之外，其他23种史书中，都涉及了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介绍和研究，各代官修纪传体史书都记载了包括东南亚、中亚、西南亚、欧洲和西非许多重要的地区和国家在内的概况和历史。

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萌生，始于19世纪中叶，这和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中国先进分子为拯救民族危机“睁眼看世界”，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下，中国世界史研究从“萌生”而逐渐发展，力图通过外国“亡国史”、“革命史”、“建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② 《前汉书·司马迁传》，《二十五史》第1卷，上海：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18页。

国史”的研究,寻找中国独立、自由、解放的道路。辛亥革命期间,美国《独立宣言》(当时译为《美国独立檄文》或《美利坚民主国独立文》)曾五次在《国民报》、《民国报》等报刊全文发表,决非偶然。20世纪初,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对中国史学,特别是对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深远影响。1920年,李大钊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一文中,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强调“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①除李大钊外,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瞿秋白、恽代英等,也开始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在唯物史观理论的指导下,人们对“改造世界”的理性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抽象的“学术”。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特点是与时代的脉搏同时跳动;它研究方向的主流,从不曾脱离时代的主题,乃是中国世界史研究萌生时期即表现出的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继续发扬光大,并不断赋予其新的社会意义和时代内容。

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这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这份代表国家学术水平的刊物,是在党和国家实现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创办的。在重大历史关头,担负着引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历史重任,《中国社会科学》的形象,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1980年,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的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进入迅速发展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全面恢复;北京大学等高校历史系开始设立世界历史专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招收世界史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国家级的《世界历史》杂志创刊,在国内外公开发行;10余个全国性的世界史研究会(国别史或专门史)相继成立;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世界史组,开始接受世界历史科研项目的申报和评审,等等。然而,这一切令人鼓舞的事实,并没有解决一个更为迫切、更为直接的现实问题,即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继承发扬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优秀传统,自觉坚持世界史研究的方向问题。“文革”十年动乱造成的严重思想混乱,要真正做到“拨乱反正”尚需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并不等于这条路线就可以一帆风顺地贯彻落实了。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学术思潮,包括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鱼目混珠,大量介绍到国内来,一时不少奇谈怪论充斥其间,有人甚至公开鼓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出路,是“国际化”,是“价值中立”,是“全盘西化”等,所有这些使得“方向”问题越发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是学术界的一面旗帜,它的编辑方针,以及渗透这一方针的每期刊物,旗帜鲜明地告诉人们什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什么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使命和责任、什么是代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前沿水平的精品力作,因此每期读来除有具体知识上的收获外,还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中受到教育和启迪。自然,每期发表的优秀学术论文,对当代中国学术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些论文在总体上所体现的学术研究的精神力量和时代风范,对当代中国学术成长尤其具有

^① 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史学要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3—344页。

特殊的意义,即“根基”和“导向”的意义。就世界历史研究而言,《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文章并不多,这可能和世界历史学科自身发展的水平有关,和不少优秀作品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兄弟刊物《历史研究》有关,但《中国社会科学》对30年来中国世界史学科成长的深远影响,却是不可忘却的,这首先是关于世界史学者的社会责任问题上。不仅是世界史学者,其他各研究领域实际上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如何体现出它的社会责任,《中国社会科学》30年在这方面始终是一个榜样。所谓“社会责任”,就是说,究竟是出于怎样的目的进行学术研究?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名利而研究,还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研究,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基本立场问题。世界史或其他学科研究的主、客体有其特定的内容和规范,但这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并不相悖。世界历史研究的社会责任,从根本上要落实在“二为”方向上。

《中国社会科学》的论文,不是靠空泛的议论来论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责任,而是通过刊物自身所蕴涵的内在精神来回答这个问题,因此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历史研究的成果令世人瞩目,但毋庸讳言,在前进的道路上仍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少数人仰承洋人的鼻息,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西方的史学理论,生吞活剥,盲目崇拜,甚至主张放弃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去与西方“接轨”,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受制于人,丧失起码的学术尊严和民族自信心。这与我们所说的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史学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当前,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和商业上的投机心理侵蚀着学术,世界历史研究也不是在真空之中,如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假冒伪劣、抄袭剽窃;热衷炒作、拉拉扯扯,无原则的吹捧等等,而信仰、理想、使命等,却被抛到九霄云外。凡此种种,都是没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的具体表现。学术研究是一项严肃、艰苦而又崇高的工作,研究人员要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要发展,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首先要加强研究人员的社会责任感,要牢记学术研究的目的。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能力和成果,是国家文化力量的重要标志和体现,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充分认识广大世界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联系到《中国社会科学》30年来为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实践,以及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现实,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世界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其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统领世界史研究,重视对世界史研究中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在充分实现世界史研究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同时,服务大局,自觉地坚持“二为”方向。《中国社会科学》曾多次发表关于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问题的论文,这个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世界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吴于廑、齐世荣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和《世界通史》时,曾探讨过这个问题。目前,世界史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正不断深化。

吴于廑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漫长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①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1、5、15页。

吴于廑关于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世界历史概念并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与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① 马克思强调:“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②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今天我们理解“全球史观”的理论基础。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了齐世荣主编的4卷本《世界史》。这部著作的“前言”写道:“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几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几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无一例外地按照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过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在某一阶段。总的说来,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尽管先后不一,形式各异,但这个纵向发展的总过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③ 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化的主要标志,是将理论上的探析同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的研究结合起来,使人们不仅从理论上,而且通过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实际过程,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真谛。

其二,《中国社会科学》始终如一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深刻的理论探究与高度关注现实的辩证统一。30年来,从来不刊发那些孤芳自赏、无病呻吟,或空洞无物、装腔作势的文章,这是对当代中国学术成长的重大贡献,表明它不愧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流砥柱。中国世界史研究历史感与现实感并重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重视弘扬历史研究的时代精神,将历史认识建立在对当代世界和中国现实的深刻理解上。对现实理解的深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历史认识的深度,成为越来越多的世界史学者的共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④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清醒地认识到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际国内现实,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才能有根有魂,广大世界史学者才能自觉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例如,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13卷,包括《沙特阿拉伯卷》和《以色列卷》;《伊拉克卷》;《土耳其卷》;《巴勒斯坦卷》;《伊朗卷》;《埃及卷》;《阿富汗卷》;《叙利亚和黎巴嫩卷》、《也门卷》、《海湾五国卷》、《约旦卷》、《塞浦路斯卷》。这是我国第一部多卷本《中东国家通史》著作,商务印书馆自2000年开始陆续出版,这既是一部学术精品,对世界历史学科建设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批判。

又如,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治水社会”的理论,杜撰出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他不仅攻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歪曲古代中国、希腊、印度和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页。

③ 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当代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71页。

及的历史,而且污蔑社会主义国家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变种”。为了揭露这部“学术著作”的欺骗性和反动性,1995年,《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开辟专栏,组织世界史学者撰写论文,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谬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包括世界史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不能失语。不久前病逝的吴冠中先生曾说:“走上艺术的路,就是要殉道,还需要痛苦,而我的心永远被苦缠绕着”。^①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同样需要殉道者的精神,要时刻牢记自己平凡而又崇高的使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工作,在科研工作中开拓创新、锤炼自我,努力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

〔责任编辑:姚玉民〕

儒学与“和谐社会”建设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三十周年

汤 一 介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他又说:“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就是说,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就是要求我国56个民族共同来建设的“和谐社会”。我今天想讲的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和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之间有什么关系。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而儒学在我国历史上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不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华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我们不能在没有文化传统的空地上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复兴,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自远古就有着社会和谐的追求,《尚书·尧典·虞书》中说:“协和万邦”,即要求天下万国和谐相处。至孔子而有较为系统的建设理想社会的蓝图,《礼记》的《礼运》篇中,记有孔子的一段话: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

^① 韩小蕙:《文艺·人生·时代——从吴冠中现象看文艺家与时代的辩证关系》,《光明日报》2010年8月5日。